

WAN QING  
TU SHU GUAN  
XUE SHU SI XIANG SHI

晚清  
图书馆  
学术思想史

程焕文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

程焕文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程焕文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4

ISBN 7 - 5013 - 2409 - 3

I . 晚 … II . 程 … III . 图书馆学史—中国—清后期 IV .  
G250.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31 号

---

**书名**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

**著者** 程焕文 著

---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 nlc. gov. cn(投稿) btsfxb@ nlc. gov. cn(邮购)

**Website** www. nlcpress. 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75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70 千字

---

**书号** ISBN 7 - 5013 - 2409 - 3/G · 563

**定价** 25. 00 元

## 序

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处在新与旧的交替、进步与落后激烈斗争的时期，也是古代藏书楼衰落、近代图书馆兴起的时期，同时还是西学传入和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影响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时期的时期。因此，无论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还是从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内容上，都应该成为我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研究重点。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史的研究虽有所展开，但既不深入，也不系统，而对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的研究更是我国图书馆学术研究中的空白。

作者以西学东渐对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影响为考察对象，在掌握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国内外现有资料，并进一步搜集了大量报刊、文集、日记、奏报等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立足于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同时，抓住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是伴随着中国古代藏书楼的衰落和近代图书馆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的这一条主线，从西方传教士对西方图书馆及图书馆观念的宣传介绍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中国人创办近代图书馆三个基本途径，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全新的、全方位深入细致而又清晰的阐述，理清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应该说，《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是一部从系统研究中寻求突破和创新的力作，是作者近十年来对资料全面占有和努力拓展的学术创新的产物。

该书作者视野开阔，思路清晰，不是采用可观的篇幅、面面俱

到的论述方式去模糊创新点,而是撷取某些曾被人忽略或未曾深入研究的主题,如论述林则徐和魏源等早期维新派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认为近代中国对西方图书馆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起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之时。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林则徐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林则徐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而组织翻译外国书报,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声。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除记述五大洲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概况外,还记述了欧洲各国图书馆和美国图书馆的状况,同时林则徐将西文的“图书馆”一词均译成“书馆”,林则徐应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之嚆矢。继林则徐之后,进一步了解和介绍西方图书馆的当推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该书收录了当时中国人所能了解的一切海外知识,包括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和向西方学习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以西洋人谈西洋”图书馆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图书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对清末新政时期公共图书馆观念的广泛传播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的图书馆“官制”的确立和“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等预备立宪筹备计划的制定,充分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后维新人士主张学习西方图书馆、倡导新式图书馆思想观念,显示出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是沿着公共图书馆观念的传播和公共图书馆的创办这条主线产生和发展的,它为民国以后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作者将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研究放在晚清大变局的社会思潮背景下进行观照,采用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系统研究方法,便于人

## 序

们从多个层面和多个角度认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史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对系统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从方法论而言也极具启发意义。

借此机会,特别提到的是本书的作者——程焕文教授。程焕文同志1961年出生于湖北红安、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198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获史学博士学位。1992—1993年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院做访问学者,1998—1999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生院做高级访问学者,2001—200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做高级访问学者。1986年分配到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管理系任教,兼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与资讯科学研究所所长,信息与网络中心主任,同时还有许多学术兼职。著有《中国图书论集》(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文化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台湾学生书局)、《信息高速公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发表中外文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程焕文同志热爱图书馆学专业,忠诚于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的一位青年才俊,这部《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是他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研究成果。全书结构完整清晰,内容资料翔实,所取证据可靠,所作分析中肯,行文流畅规范,新意创获颇多,其思想内涵和启发意义均见深厚功力,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我衷心祝贺《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出版!深信作者将会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彭斐章

2003年10月4日于珞珈山

## 序

焕文同志的新作《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学术思想史的写作,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他认真地去做了,而且做得较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并特别地予以赞赏。

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艰难困苦的工作。学术史的研究,不仅要求作者全面地掌握文献,深入地阅读和分析写作者的本旨,也就是正确地解读,而且还要求作者了解学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深入探讨学术发展的源流演变,并且还要有特别的眼光识别写作者的创新与开拓,分析著述的因承与传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综观全局、细致分析,把握全面与局部、著作与写作者以及前因后果,写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学术评论,而这样的学术史才有借鉴意义。以上只是就一般学术史而言,具体到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则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图书馆(古代称藏书楼)是一种社会文化机构,就行业特点而言,具有附属性、服务性、公共性,这是一种共识。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人们把论及藏书的制度、典籍的分类与编目的文字,都是归之于“术”,不是“学”,称之为“器”,不称它为“道”。确实,中国古代藏书方面的有关论述很少说明藏书的功用与典籍的功能,比较多的是叙述藏书的演变,或者是讨论典籍的整理,这也就是说,关于图书馆学术、思想、观念等我们可以称之为学术思想的内容是十分单薄的。到了晚清,才逐步出现有关建立图书馆的目的、意义的讨论,才开始认真分析图书馆与社会、与教育、与民众意识的关系,或者说,到了这时,才有比较完整的图书馆学思想出现。当然,晚清以前的藏书思想在本质上同样是学术性的,否认它的学术性是

不全面的。只不过那时这方面的有关著述相对比较缺乏,这只是学科发展的先后问题。

晚清图书馆学的发展与晚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同步的。19世纪后半叶,随着列强侵入中国,一些沿海城市中出现过一些传教士办的图书馆,当时称为藏书楼或图书馆,大致都是“Library”的意译。19世纪80、90年代,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学说的传入,朝野开始重视对东西方的考察和介绍。作为一种对民众教育的工具,图书馆与博物馆,读书与翻译、出版西书,被视为提高民众意识,提升民族素质,进而富国兴邦之大计,并因此而受到重视。对图书馆这一新的事物,维新派加以推广,革命派力图掌握,都是从教育民众、团结队伍的目的出发的。20世纪初年,图书馆是公众文化机构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办图书馆是一件有利民众、振兴国家的事。1909年,清廷学部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把近代图书馆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从晚清图书馆的发展来看,要推进图书馆的发展,就有讨论、介绍、评论图书馆之文章,也有向朝廷呈送的奏折、申请办理图书馆之呈文,或是图书馆之章程、规定、条例和文告、启示,它们共同构成了可以称之为思想、观念的东西。因之,也就构成了晚清图书馆学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晚清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既是新与旧的交接,革命与反动的较量,更是社会生活急剧动荡,人们意识变化极为复杂的时代,所以,反映在图书馆学术思想上也是多样的。在借鉴西方图书馆之发展,检阅中国历史之历程的过程中,一些学者看到了西方图书馆建设之进步,同时又认为我国图书馆之发展也不落人后。一些办理图书馆之官吏,言称依乾隆之故事,成效可观,又欣赏英美之成规,以便增益人才。包括当时创办图书馆之士大夫阶层在内,办理图书馆的人士一直是将“存古”、“开新”之意贯穿于各种工作中,落实于日常行动里。因此,在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中,反映旧的观念,试图将其落实到办馆思想、宗旨和工作内

## 序

容之中者有之；反映新的思想、观念，力图按近代西方图书馆办理的主张、言论，也是不乏其人的。这反映在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中，则更为集中、更为典型了。这也可以说这是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复杂性。

正是因为以上的一些客观情况，我前面指出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写作是费力的，正好说明了焕文同志所作研究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在。

从 20 世纪初年到现在，在几乎近一个世纪的图书馆学论著和文章中，关于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论述是相当少的。1931 年，也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何多源先生连续发表了《中国图书馆学术史》的文章，何先生针对 20 世纪 10、20 年代，主要是 20 年代图书馆的各个业务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了初步的回顾，也对某些方面的不足作了评价。所以说，何先生对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20 世纪 80 年代，谢灼华、徐雁、况能富关于中国古代藏书思想的研究，一度引起了同行的关注，但是，终因研究力量的薄弱而未能开展系统的工作。90 年代，关于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状况时冷时热。相对来说，也未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论著。这种局面，到世纪之交才有所改变。譬如，一部分学者比较注意研究中外图书馆学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写出了有一定力度的研究论著。同时，部分学者从总结 20 世纪图书馆学术的角度，作了分专题的、分问题的研究成果分析，这是十分有用的研究，而且也为全面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关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立 80 周年纪念，关于沈祖荣先生的相关研究，关于刘国钧先生、王重民先生的纪念活动，也有利于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发展大环境中，焕文同志关于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的研究，得以顺利地完成，并比较快地呈献于读者面前。这是我们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写作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注意一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关系,引导读者从本质上研究问题,这是《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写作的重要特点。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文化机构,它的产生、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认识。但是,不同的历史时间里,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的文化氛围下,图书馆的建立、发展及其社会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近代中国由于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腐败,国力日衰,世变民穷,故近代作为进步努力的改革与革命,大致都集中在所谓“富国强民”的目标上,而这样的主张和号召又都集中在利用相关书刊和组织出版物上,故办理阅览室、藏书楼(晚清称呼图书馆的特殊名称),不仅是一种启迪民智的举动,同时也是组织成员、完成团体目标的基地,如戊戌变法时各地办的学会藏书楼,民主革命运动时革命派办的阅览室、阅报室等。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些图书馆建立时的主张、观念,评价当时的阅览制度等问题时,就应该不仅要联系该团体的政治主张、组织原则与活动方式,更要注重分析它们办理图书馆(室)的实际效果,即宣传舆论中组织民众、团结团队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做到这点,就表明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态度是认真的、方法是科学的,因而研究结论也是可信的。《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写作力图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其中有些问题是研究较多的,如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办图书馆的分析。这样,作者利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探讨了他们的办图书馆主张之特有认识,为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当然,有些问题是今天,包括以后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如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图书馆的意图、办馆主张和办馆制度、规定,这些图书馆与中国官办、民办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读者中的直接影响等等,我们如果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近代社会中各种类型图书馆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重视个案研究,从中找到某种趋向、特质,从而认识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内容,这也是该书作者努力的结果。晚清有关图书

## 序

馆之言论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从进言之人看,有朝廷命官,也有民间绅商;有维新志士、革命党人,也有赶潮流的封建顽固派。如果某个历史时代大家都谈典籍,讲藏书,大致总是有人是为自己讲的,有人是为别人讲的。晚清倡言图书馆,其目的有差异,其内容有区别,其效果大不同,因此,我们讲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希望加强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作总的研究和分析。焕文同志在分析晚清各种图书馆言论时,很注意个案的分析。如关于图书馆介绍方面影响颇大的王韬,作者就为之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又如辛亥革命前各行省创办省图书馆,一些省级行政官吏是抱着不同的目的在操作的。因此,对这次称之为公共图书馆建设高潮的举动,也必须比较详细地分析。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可取的。

科学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新知,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追求,也就是通过研究,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认清历史的发展走向。在这里,我又回到本文的开头,搞学术思想史难,所谓难,就如章学诚称目录学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样,学术思想史是认识某个学科之钥匙,也是评判某个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尺,所以说它难。但是,工作总是要人去做的,如果想到自己曾经搬过一块砖,盖过一片瓦,那么,当人们感叹建筑物之雄伟而只记得建筑设计师时,我们这些当过小工的人们,也可自豪地说,这幢楼房我也参加过劳动。其实,有这种自我安慰,也是一种成就感。我这种认识,不知大家以为然否?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现在有人做,以后还可继续做;而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研究,建国五十年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研究,以至分专科、专题,分专人、团体的学术思想研究,同样也是要有人去做。那么,图书馆学研究,必然更为丰富和全面。

是为序。

谢灼华

2003年10月

## 序

程焕文教授的《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一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西学东渐与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研究》基础上经他反复修改、补充材料，进行文字修饰后才拿出来出版示人的重要论著。该书从西学东渐的视角探究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在晚清社会大变局时代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重点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与晚清社会思潮、西学东渐与晚清中国图书馆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弥补了此前有关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研究的不足。作者花了大力气去搜集材料，就西方传教士的传播、中国人士的出洋考察、维新人士的倡导与清末新政的推动等途径来集聚材料，认真地探研西方图书馆在中国的介绍与宣传、新式图书馆在中国的倡导与创办、公共图书馆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公共图书馆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从而论证了晚清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为民国以后中国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奠基和实践的作用。本书通过全面和系统地陈述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使人们对公共图书馆思想、图书馆管理思想、图书馆技术方法等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正确的理解。本书是我至今看到的将西学东渐与晚清中国图书馆学联系起来研究，花大力气写成的具有明显特征的一部力著。本书特点如下：

(一)概念清晰明确。何谓图书馆？过去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由于概念界定不确，产生诸多淆乱，带来误解和以讹传讹。本书对将图书馆界定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表示认同，但作者不同意图书馆即“中国古代的各种藏书处所”，以及在19世纪末中国才出现“图书

馆一词”的提法。作者通过对各种文献的勘比认为“藏书楼”不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各种藏书处所的通称,因为在中国古代,或者说在晚清以前,中国的藏书处所的命名没有定制,即没有像西方所用的“图书馆”一词那样的通用名称和功能。“藏书楼”完全是一个“近代化”的名称,不可以用近代人的通用名称去称谓古代的事物。进而作者论证了“藏书楼”和“图书馆”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都是一个近代通用的名称。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在晚清以前中国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图书馆学科,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出现是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化的结果。作者就以此立论,将视野触角伸向世界,并通过晚清中国各方人士对西方图书馆学的了解、介绍和形成中国图书馆学的曲折过程,明确指出当“藏书思想”和“图书馆学术”相互融合的时候,也即是中国人近代图书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时候。概念明确了,立论才能有序,陈述才能心中有数,做到有的放矢,避免盲目和无序的推论,以及拼凑式和重叠式的堆砌。从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和陈述,可以清楚看到作者的苦心和用意。

(二)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衡量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在于它的创新。如果一部著作资料不新,观点陈旧,人云亦云,人家不讲,自己无话可说,这样的著作就学术价值而言便无从谈起。本书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更具创新意义,作者非常认真地检索、梳理和总结此前中国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成果,非常详细地了解和分析国内外对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论著的优长和不足,以及各种史料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情况。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人详我略,人略我详的方法,从我国图书馆学的薄弱点切入,研究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关系,将西学东渐与晚清中国图书馆学的兴起和发展作为重点,使得本书重点突出,思路宽广,给人一种清新睿智的感觉。如果脱离了西学东渐这个社会思潮的发展背景,我们便无法真正地弄清晚清图书馆学术产生

## 序

和发展与晚清社会和社会思潮的相互关系。作者把握住在晚清社会思潮,尤其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我国图书馆学术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也是随着我国社会近代化事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文明,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工程。就这点而言,本书也给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和文化机缘。

(三)材料使用广泛,立论有理有据。本书作者参考的文献有论文、著作达200多种,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既有前人研究综述、近代图书馆学史综论、藏书楼衰落与图书馆兴起、洋务运动与地方官书局、西方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传教士与中国图书馆等,也有晚清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与中国图书馆、西洋图书馆史、日本近代图书馆的进步等等。正因为如此。本书空论陈述很少,立论有据,文字简洁流畅,详略有度,可见作者煞费苦心。

程焕文是陈胜彝教授指导的博士生,他聪明好学,非常能干,在图书馆方面用功多年,对图书馆学有深入研究,也有很多成果。他又是现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并经常参与国内外各种学术活动,对学术动态非常了解,资料熟识,随便应付式地拿出一篇博士论文并不难,但他没有这样做。焕文对学术非常认真和执着,他苦读苦想,花去了7-8年时间才拿出这篇论文,俗话言“十年磨一剑”,皆属精品,焕文的大著撰就虽未达10年,但8年也不算短。待他的论文杀青时,他的导师陈胜彝教授因患绝症住院治疗无法亲自审阅,我代陈教授就焕文的大作进行一次粗疏的审读,初步感觉论文有特色有新意,并建议他权衡各方,就论文作进一步的修改,删繁就简,突出特色。他非常谦虚,就我们提出的建议几乎全盘接受,对论文做了非常认真的综合、修改和提炼。现在这个书稿比初稿又有了很大的提升,水平上了一个档次,与前人的研究相比不仅有新的突破,有许多优长,而且有些议题详人所无,颇有新意。

##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

在本书即将出版面世时，焕文嘱我为他的大作写些话语作序，  
我不好推脱，正好借本书出版问世之机，向焕文道喜、祝贺，并写了  
上述一些话，以为序，与焕文共勉！

林家有

2003年11月

于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实斋

## 前　　言

在几千年的中国藏书思想与图书馆学术历史长河中,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1840—1911)不过是一段十分短暂的历史,但是,它却是一段十分重要甚至特别精彩的历史。之所以说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十分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古典藏书思想向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转变的基奠,如果我们忽视了这段重要的历史,那么,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术史就会形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所以说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特别精彩,是因为它孕育于雷电交加之夜,产生于惊涛骇浪之中,蹒跚于风雨飘摇之际,且一直与晚清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新学与旧学的激烈交锋、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激荡、古代藏书的衰落与近代图书馆的兴起等彼此交融、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真可谓千载难逢的历史景观。尤其精彩的是,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主体并非是纯粹的“图书馆学家”,而是维新人士、开明士绅甚至封疆大吏,进步的与反动的、改良的与保守的……各类人物应有尽有,因而其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传播受众更多、力度更强、范围更广、影响更大。

然而,长期以来,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难点,甚至盲点。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中国图书馆学界向来忽视图书馆学史的研究,以至于有关图书馆学术史的专门著述屈指可数,而有关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专门著述则几近空缺;二是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的学人凤毛麟角,以至于在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举目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则正是这样一块离我们很近的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三是晚清图书馆学术

##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

思想史史料非常零散,晚清时期的图书馆学术思想专门著述并不多见,而晚清社会思潮又异常繁复。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可谓难上加难,以至于常常令人望而却步,不敢问津。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缺失不仅造成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术史的“历史断层”,而且也导致了图书馆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术史的“认知迷失”,以至于不少误读的史实与误解的思想通过各种教科书或权威著作以讹传讹,进而成为图书馆学界的“共识”,并“教育”了几代学人。

早在 20 年前师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谢灼华教授研究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时,笔者就曾多次产生过弥补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研究缺失的冲动,但是后来苦于事务繁多,一直只是心动而没有付诸行动。1994 年,承蒙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陈胜彝教授厚爱,笔者开始攻读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良久的心动才开始变为行动。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这种行动后来竟然演化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蜗牛式”行动,因为如果从 1994 年算起的话,那么到 2003 年完成定稿,这部小小的著作前后差不多花了 9 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

记得在 1994 年刚刚迈入师门时,导师陈胜彝教授曾笑言:文科的博士学位应该读 8 至 10 年才比较合适。没想到导师的谶语竟然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虽然这种应验更多地显示的是笔者的无能与无奈,但是在“应验”的过程中却饱含着导师陈胜彝教授以及许多师长和亲朋好友对笔者的期待与关爱。1997 年笔者开始进入本著写作之时正值导师陈胜彝教授身患绝症之际,在其后的近 6 年中,导师陈胜彝教授一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志和无法企及的毅力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一边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学识和刻骨铭心的慈爱为学生授业解惑和指点迷津。我永远无法忘记导师在床榻上忍受着刺骨的疼痛对学生迟迟无法完成学位论文的不断